

蒙元的服饰

徐文跃

蒙元一统，其冠服制度既参酌古今，袭取汉制，又兼存国制。

其立国虽短，而冠服制度流风及于明清两代，甚至域外的高丽、朝鲜两朝。

如帽笠、辫线袄、搭护、胸背等，其服饰制度与装饰艺术方面，

乃自五代辽宋夏金之后一次大的统合，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蒙元一统，其冠服制度既参酌古今，袭取汉制，又兼存国制。其立国虽短，而冠服制度影响深远，流风及于明清两代，甚至域外的高丽、朝鲜两朝，如帽笠、辫线袄、搭护、胸背等。又，蒙元时代，乃五代辽宋夏金之后一次大的统合。这种统合同样也表现在冠帽服饰及其装饰艺术方面，如源自辽人「春水捺钵」^一和宋人「池塘小景」^二交融而成的「满池娇」^三，源自金人的云肩、通袖、膝襴，袭自宋人以珍珠用以装饰冠服的习俗，都在蒙元服饰中得以袭用。同时，与当时特有的辫线袍、胸背等一道，对后世产生影响。本文试通过蒙元冠帽服饰中的帽笠、辫线袍、搭护、胸背等几个侧面，对蒙元冠服及其装饰艺术并其在后世的受容作一简单探讨。

一 凤簇珍珠帽——帽笠

(一) 元代帽笠

蒙元时代，不论男女，均戴冠帽，男子「冬帽而夏笠」，各有规制。叶子奇《草木子》载：「帽子系腰，元服也。」^一又谓：「元代官民皆戴帽，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二据《元史·舆服志》^三

^一 捺钵，契丹译语，本意为辽帝出行居止的行宫、行营、行帐，后用以指称四时出行的制度。

^二 满池娇，其名首见于宋人，后为元代御衫上的图案，其主要纹样为池塘中的水生植物和水禽。满池娇纹样也常见于青花瓷和金银器等上。关于满池娇，详见扬之水《「满池娇」源流——从鸽子洞元代窖藏的两件刺绣说起》。

^三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第六一页。

所载，天子质孙服^四，冬之服有十一等，夏之服有十五等，又据所穿衣服的不同，所戴帽笠也各有不同：冬天有金锦暖帽、七宝重顶冠、红金褙子暖帽、白金褙子暖帽、银鼠暖帽；夏天则有宝顶金凤钹笠、珠子卷云冠、珠缘边钹笠、白藤宝贝帽、金凤顶笠、金凤顶漆纱冠、黄牙忽宝贝珠子带后檐帽、七宝漆纱带后檐帽。原本《老乞大》^五所记元人冠帽亦有水獭毛毡儿、貂鼠皮簷儿、单桃牛尾笠子、暗花绞丝帽儿、云南毡海青帽儿、青毡钵笠儿、貂鼠簷儿皮帽、毡帽儿、桃尖棕帽儿、副圆棕帽儿、织结棕帽儿诸项。

蒙元时代不唯帽笠种类繁多，其帽顶和帽缨且多用各式金玉珠宝装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五「河南王」条载：「河南王卜怜吉歹为本省丞相时……一日行郊，天气且暄，王易凉帽，左右捧笠侍，风吹坠石上，击碎御赐玉顶。王笑曰：『是有数也。』」^六上海青浦县元代任明墓曾出有春水玉帽顶（图二），全器透雕而成，莲荷之下立以水禽，其时流行春水玉，河南王所碎御赐玉顶或即此类。据考古发掘，蒙元帽笠与帽顶、帽缨亦有并出之例，如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所出镶宝石笠帽（图三），帽、顶、缨并存，其以金玉为顶，并缀十三颗各色玉石为缨。

其时帽顶所用各色宝石，种类亦繁。《南村辍耕录》载：「大德间，本土巨商中卖红刺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直中统钞一十四万，定用嵌帽顶上。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宝重。凡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时，则服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其后并开列有各色宝石名目^七。当时所用宝石之多、帽顶之繁丽据此可以想见。因帽笠之上饰有各式珍珠、宝石，故又有「珠帽」和「珍珠帽」之称。

蒙元帽笠有创自宫中、国人得以着戴者，如前加檐帽。《元史·世祖昭睿顺皇后传》载：「旧制帽无前檐，帝因射，日色炫目，以语后，后因益前檐，帝大喜，遂命为式。」又曰：「国人皆效之。」汪世显家族墓所出前加檐帽正为此类（图三）。亦有只限宫中、外人禁止制造或是着戴者。《元典章》载，大德元年中书省咨利用监呈杂造局申告云：「上位新样黑羔细花儿斜皮帽子一个，进献上位看过。钦奉圣旨，今后这皮帽子休做与人者，与人呵，你死也！」^八其时不唯对帽笠式样有所禁制，对帽顶也有禁限。同书载大德十一年规定：「金翅雕样皮帽顶儿，今后休教做，休交诸人带者。做的人，根底要罪过者。带的人，根底夺了，要罪过者。」^九

^四 质孙，蒙古译语，又作只孙、济逊，意为颜色。质孙服，即一色衣。

^五 《老乞大》，老乞大，即「老契丹」，殆为老汉之意。《老乞大》是高丽和李朝学习汉语会话的教科书，其与后文所提的《朴通事》都是当时学习汉语会话的重要教材，且都有注解，即韩文注解。

^六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八三页。

^七 同注六，第八二一—八三三页。

^八 《元典章》卷五八「工部卷之一·造作一·杂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二一三五页。

^九 同注八。



图一 元 春水玉帽顶
上海青浦县元代任明墓出土

图二 元 镶宝石笠帽
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



图三 元 前加檐帽
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



(二) 明清帽笠

元明易代后，朱元璋诏令「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可事实上帽笠、帽顶、帽缨之制仍被袭用。《明史·舆服志》载：「凡职官，一品、二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彩绣，帽顶、帽珠用玉；三品至五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金，帽珠除玉外，随所用；六品至九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银，帽珠玛瑙、水晶、香木。一品至六品穿四爪龙，以金绣为之者听。」同书「庶人冠服」条亦载：「庶人帽，不得用顶，帽珠止

许水晶、香木。^①二〇〇一年，湖北钟祥市发掘了明代永宣时期的梁庄王墓，墓中共出有帽顶六件，均由喇叭形金镶宝石覆莲底座和座顶镶嵌宝石或镂空玉龙的顶饰组成（图四）^②。梁庄王墓所出帽顶当时原应嵌于何种冠帽之上，墓中所出无由得解，所幸从存世的《宣宗行乐图》等图像中可一窥真相。图中明宣宗头戴窄檐大帽，帽檐外参如钹笠并饰珍珠，帽顶则缀一顶座，上饰宝石（图五）。

明清易代，帽顶之制亦被袭用。清代朝冠和吉服冠两种冠帽之上皆饰帽顶，亦用以区分等级。帝后、诸王、贝勒、贝子及文武大臣所用帽顶各别。其时帽顶之制如下：一品用红宝石顶，二品用珊瑚顶，三品用蓝宝石顶，四品用青金石顶，五品用水晶石顶，六品用砗磲顶。而后宝石为玻璃所替代，故而称呼上也相应地有所变化。如称一品为亮红顶，二品为涅红顶，三品为亮蓝顶，四品为涅蓝顶，五品为亮白顶，六品为涅白顶。至于七品的素金顶，也被黄铜所代替（图六）。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梁庄王墓》，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八年。



图四 明 金镶蓝宝石帽顶
梁庄王墓出土



图五 明 《宣宗行乐图》卷 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六 清 三品夏吉服冠
美国丹佛艺术博物馆藏

图七 高丽李兆年肖像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



图八 《李朝哲宗大王御真像》及局部
韩国国立古宫博物馆藏



(三) 朝鲜帽笠

蒙元帽笠之制并其装饰帽顶、帽缨之习，除在国内为明清所袭用外，也很早就传入了朝鲜半岛。元时高丽，世子多入居大元。忠烈王在元时，即行胡服辫发^二。一二四七年归国继承王位后，忠烈王主张尽快实行辫发、胡服。《高丽史·舆服志》「冠服通制」条载：「忠烈王四年二月，令境内皆服上国衣冠，开剃。……恭愍王六年闰九月……今后，文武百官，黑衣青笠。僧服，黑巾大冠。……十六年七月，教曰：……今后诸君宰枢、代言、判书、上大护军、判通礼门三司左右尹、知通礼门，黑笠白玉顶子；三亲从诸总郎、三司副使、八备身前陪后殿护军，黑笠青玉顶子；诸正佐郎，黑笠水精顶子；省台、成均、典校、知制教员及外方各官员，黑笠随品顶子；县令监务，黑笠无台水精顶子。九月，百官始着笠朝谒。二十一年五月，命代言班主以上皆戴黑草方笠。二十三年四月，命宰相、台省、重房阁门，着笠。辛禡元年十二月，始令各司胥吏着白方笠。」^三现今传世高丽时期的容像中多有作元人装扮者，正缘于此（图七）。

至高丽为李朝所取代，帽笠、帽顶、帽缨之制仍行不废。成书于李朝初期的《经国大典》「礼典·仪章」条即对帽顶、帽缨质地、颜色作有详细规定：「一品常服纱帽贯子，笠缨用金玉，笠饰用银，大君用金。二品常服纱帽贯子，笠缨用金玉，笠饰用银；三品常服纱帽堂上官贯子，笠缨用金玉，笠饰用银。……堂上三品以上为乌纱帽（纹纱角），戎服紫笠贝缨，堂下三品以下，乌纱帽（单纱角），戎服黑笠晶缨。」^三通观李朝一代，帽笠、帽顶、帽缨一直被使用，这在李朝众多容像并出土或传世的实物中得以验证（图八）。

^二 见《高丽史》「世家二十七·元宗十三年三月」条，「世子知之，不得已请于帝。国人见世子辫发胡服，皆叹息，至有泣者」。

^三 《高丽史·舆服志》「冠服通制」条。

^三 《经国大典》「礼典·仪章」条。

二 龙盘锦绣袍——腰线袍与辫线袍

蒙元时代服饰名目繁多，据元明之际通俗读物《碎金》所载，男服有遭褶、袴褶、板褶、腰线、辫线、曳撒诸类，而女服又有南北之别。这其中尤以男子所穿的腰线袍（袄）、辫线袍（袄）最具时代特点，且影响深远。

蒙元时代，腰间饰有横向捻线和竖向褶子用以收束腰身的袍服有腰线袍和辫线袍两种。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腰间缀搓捻而成「辫线」的为「辫线袍」，而腰间横缀条状织物的为「腰线袍」^{一四}。其制，《元史·舆服志》载：「辫线袄，制如窄袖衫，腰作辫线细褶。」

《黑鞮事略》记蒙元初时服饰有二：「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毳革，新以纁丝金线，色用红紫、紺绿，纹以日月龙凤，无贵贱等差。」徐霆注云：「领所以谓之方领，若四方上领，则亦是汉人为之，鞮主及中书向上等人不曾着。腰间密密打作细褶，不计其数，若深衣止十二幅，鞮人褶多尔。又用红紫帛捻成线横在腰上，谓之腰线，盖欲马上腰围紧束突出，采艳好看。」^{一五}蒙元初起，天下草创，未遑制作，所以腰线袍等上得以日月龙凤为饰。元至顺本《事林广记》后集卷十「服用原始」条提到当时流行的鞮衫「有数样，曰光腰，曰线腰，曰海青，曰袴褶，曰三佛齐之类」^{一六}，此中所谓的线腰鞮衫，指的应该就是腰线袍。

据党宝海、杨玲研究，装饰于袍服腰部的多道丝线或丝带，即「腰线」，而缝缀在袍服腰部用丝织品扭结成辫的腰线则称「辫线」，辫线为腰线之一种。腰线的蒙古语词，元至顺本《事林广记》作「不嗔」，党宝海等指出明初《华夷译语》收录有「腰线」一词的蒙文书写形式，拉丁转写为 *buq*，明人汉字音写为「不赤」，同书中，此词还指「衣带」。关于腰线，崔圭顺认为其制作方法有三：一、把自身面料加以折褶而成；二、将丝线捻成；三、把丝绸裁剪后卷成^{一七}。关于腰线的材质及辫线袍的结系，金琳通过对现存辫线袍实物的研究，认为辫线主要由两种材质搓制而成，即绉纱和加捻的丝线。而从目前所出实物看，辫线袄辫线的结系方式有三：一、纽袷式，系扣是辫线最多见的系结方式；二、系带式，用丝带结系；三、扣带式，穿着时将带子穿入扣袷中打成结即可^{一八}（图九、图一〇）。

^{一四} 党宝海、杨玲：《腰线袍与辫线袄——关于古代蒙古文化史的个案研究》，《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二辑）》，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第二九一—四八页。

^{一五} 《黑鞮事略》，收入王国维笺证《蒙古史料四种》，《王国维遗书》一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六一—七页。

^{一六} 元至顺本《事林广记》第四册「后集」卷一〇，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第九页背面。

^{一七} 崔圭顺：《元世祖出猎图所绘世祖服装考》，《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艺纱堂，二〇〇六年，第一九六—二〇八页。

^{一八} 金琳：《浅议蒙元辫线袄的制作工艺》，《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艺纱堂，二〇〇六年，第二二六—二二三页。



图一〇—元 暗花绫腰线袍
英国 Rossi & Rossi 画廊藏



图九—元 织金锦辫线袍
英国 Rossi & Rossi 画廊藏



图一〇—二 元 暗花绫腰线袍腰侧的扣袂



图九—二 织金锦辫线袍腰间横向所缀的辫线和下幅竖向的褶

袍服腰部所饰腰线，颜色各别。徐霆所云乃用红紫帛，《世祖出猎图》（图一）等上所见即此。而提及元人腰线颜色最为绚丽的，则数原本《老乞大》。其中提及商铺里的腰线颜色，有「鸦青、鸭绿、柳青、大红、小红、肉红、桃红、茜红、银褐、鹅黄、金色茶褐、麝香茶褐、酒浸茶褐」诸色。

史料中所称的「辫线袄」「辫线袄子」，原本《老乞大》亦称「腰线袄子」。目前韩国服饰学界研究成果表明，贴里当中腰部有横线的叫作「腰线贴里」^{一九}。贴里，又作帖里、天益、天翼、缀翼、裾翼，其当为音译。据考，贴里之名乃是蒙古语「Teliq」之音译。「Teliq」最初的意义，李恩珠认为不详^{二〇}。而据党宝海、杨玲所言，蒙古语「Teliq」意为丝、丝织品、绸缎，后泛指丝麻织物^{二一}。又据李莉莎所言，「Teliq」为腰间收束的袍服的蒙古语称呼，现代蒙古语中贴里一词仍为「袍服」之意^{二二}。关于贴里，《朴通事谚解》云：「贴里，元时好看此衣，前后具胸背，又连肩而通袖之脊至袖口，当膝周围亦为纹如栏干，然织成段匹为衣者有之，或皮或帛，用彩线周遭回曲，为缘如花样，刺为草树、禽兽、山川、宫殿之纹于其内，备极奇巧。皆用团领着之，其直甚高。」^{二二}据此，则贴里亦用腰线，此中所云殆即「腰线贴里」。一九九二年，韩国海印寺大寂光殿毗卢舍那佛腹之中发现一批高丽时代的衣物。其中有一件一三二六年的腰线贴里（图二），上有墨书题记「年十五，宋夫介，长命之愿」。同时所出并有搭护等^{二三}。

贴里元代即已传入朝鲜半岛。高丽曾行胡服辫发，其时腰线贴里已见于海印寺佛腹所藏。逮至李朝，贴里仍流行不衰，《李朝实录》中关于明朝所赐并其国内所行冠服中贴里的记载甚多甚详。不惟如此，李朝初期至末期墓葬中亦多出有腰线贴里、贴里实物。李朝初期官员边修（一四四七—一五四二年）墓所出便有三件腰线贴里，其中一件为辫线袍，腰部由丝线捻成辫状（图三），另两件则为普通腰线袍，腰线用丝绸裁制。

又，因其时大蒙古国疆域辽阔，驿路相通，辫线袍也在其他汗国流行。伊朗的伊尔汗国，其辫线袍实物即多有传世和出土（图四）。



图一 元 刘贯道绘《元世祖出猎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九 同注一七。

二〇 이인주, 「한국의 명칭에 관한 연구」, 『한국의 문화』 第三号, 一九八八年, 第三六三—三七一页。

二一 同注一四。

二二 李莉莎：《「质孙」对明代服饰的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二〇一〇年第四期。

二三 安仁实：《高丽时期的男袍复原——以十三世纪腰线贴里和搭护为例》，《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艺纱堂，二〇〇六年，第三一八—三二七页。



图二 高丽 白细麻布腰线贴里
韩国海印寺大寂光殿毗卢舍那佛腹藏



图三 李朝 腰线贴里
边修墓出土

图一四 伊尔汗国时期纳石失辫线袍
丹麦 The David collection 藏



三 比胛裁成土豹皮——搭护

(一) 元代搭护

搭护，又作搭襖、搭胡、搭忽、答胡、答忽，也是蒙元时代较具特色的服装样式。搭护为蒙古语 *ᠳᠠᠬᠤ* 的音译，原意为毛皮或皮袄，后用来指一类半袖或无袖的衣物^{二四}。朱有燾《元宫词》五十六云：「比胛裁成土豹皮，着来暖胜黑貂衣。」比胛即比甲，通称搭护，土豹，即清人所谓的猞猁狲，其皮亦用于端罩。

蒙元搭护，最初当指皮袄。但据元明实物与图像资料，搭护后来亦不仅限于皮料。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元代缙织帝后曼荼罗，其上元明宗、元文宗兄弟最外所穿即为搭护（图一五）。



图一五 元 缙织帝后曼荼罗上的元明宗、文宗兄弟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二四} 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搭襖」条，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五一—一六页。



图一六 奈良时代 大歌半臂
日本正仓院藏

搭护之制，《朴通事谚解》「搭护」条注引《事物纪原》云：「隋内官多服半臂，余皆长袖。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即今背子也。江淮间或曰绰子，庶人竞服之。今俗呼为搭护。」

据《事物纪原》所言，搭护即隋唐之时的「半臂」，但实则并非如此。关于隋唐半臂，关根真隆认为乃是男子所穿且四季均可，穿着者分下层官僚在非公事场合穿着以及作为「乐服」穿着两种；其形制为垂领、右衽、袖极短，襟处有纽，附腰襖（图一六）^{二五}。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半臂，武士服」。可见在唐代（至少是前期），半臂是军人必备服饰之一。除乐舞场合和特殊情况外，半臂一般穿在袍衫之下。《旧唐书·来子珣传》载来子珣为了炫耀锦半臂将其外穿，结果招致朝士讥诮。关根真隆认为锦半臂外穿是为了夸耀，因此当穿在最外侧。与关根真隆取「外衣说」不同，黄正建取「内衣说」，认为半臂一般并不外穿^{二六}。唐代半臂内穿还是外穿暂且勿论，单从其形制和穿用之人而言，都可见与元明时期的搭护不同。

^{二五} 关根真隆：《奈良朝服饰の研究》，吉川弘文馆，一九七四年。

^{二六} 黄正建：《唐代「袴奴」、「半臂」研究与日本资料》，《丝绸之路——图像与历史》，东华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第一六八—一七六页。

(二) 明清搭护

蒙元被明朝取代后，搭护亦得以存留且有其固定搭配。明代的常服制度，典制记载不甚详悉，但稍检文献，核以出土和存世实物，可知大体由以下几项组成：乌纱帽（帝王则作翼善冠），贴里、搭护、圆领（帝王则作袞龙袍），革带，皂鹿皮靴（帝王则作鹿皮靴）。

《大明会典》卷二百一「工部二十一·织造·冠服」载：「凡赏赐衣服，……上半年成造：织金纁丝圆领八百件、素纁丝圆领二百件，纁丝褙襖、贴里各千件；绢圆领、褙襖、贴里各三十件。……下半年成造：织金纁丝圆领八百件、素纁丝圆领二百件，纁丝褙襖、贴里各千件；绢圆领、褙襖、贴里各三十件。」其中圆领、褙襖、贴里的数量相等，可知三者乃是作为常服一同用于赏赐。

明朝对属国行册封，冠服赏赐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正统九年，朝鲜谢恩使柳守刚带回明朝赐给朝鲜国王的冠服，其中常服有三套：「香皂皱（纁）纱翼善冠一顶，玉带一，袍服三袭各三件：纁丝大红织金袞龙暗骨朵云袍、青暗花褙襖、黑绿暗花贴里纱；大红织金袞龙暗骨朵云袍、青暗花褙襖、鹦哥绿花贴里罗；大红织金袞龙袍、青素褙襖、柳青素贴里。皂鹿皮靴一双。」^{二七}圆领、搭护、贴里三者俱备。最为难得的是，万历年间赐给日本丰臣秀吉的冠服仍有十五件存世（图一七），而其中便有常服，且能与明朝册封敕谕上所开列的对应（图一八）^{二八}。

明代常服实物，如鲁荒王墓、徐公墓（图一九）等墓所出者，圆领、搭护、贴里并出，而其中尤以鲁荒王墓所出等级最高。

清代亦有搭护，汉语为「端罩」，满语里将皮长外套称为「打呼」，杨宾《柳边纪略》卷三载满洲人「天寒披重羊裘或猞猁狼皮打呼」，并在「打呼」之下注云「皮长外套也」^{二九}。明末女真人曾蒙古化，满语 Dahu（打呼）当即袭自蒙语。据《大清会典》，端罩有黑狐（图二〇）、紫貂、青狐、貂皮、猞猁、红豹皮、黄狐皮等几种。按质地、皮色的好坏及其里、带的颜色，又分八个等级，以此来区别身份、地位的高低尊卑。

^{二七} 《李朝世宗实录》卷一〇三，「世宗」

二十六（正统九年，一四四四）三月

二十六日（丙子）条。

^{二八} 河上繁樹：「豊臣秀吉の日本国王册封に關する冠服について」妙法院伝来の明代官服一，『学叢』第二十号，京都国立博物館編，一九九九年，第七五—九六頁。

^{二九} 杨宾：《柳边纪略》卷三，辽海丛书本。



图一七一—明 大红织金胸背麒麟圆领
日本妙法院藏



图一七二—明 绿贴里
日本妙法院藏

图一八 明《敕諭》上记载所賜冠服部分
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館藏

紗帽一頂
金箱犀角帶一條
常服羅一套
大紅織金背背麒麟圓領一件
青搭襖一件
皮弁冠一副
七旒皂縵紗皮弁冠一頂
五章期地紗皮弁服一套
大紅素皮弁服一件
素白中單一件



图一九 明正德 杂宝纹搭护
徐公墓出土



图二〇 清 黄色暗团龙纹江绸玄狐皮端罩
故宫博物院藏

(三) 朝鲜搭护

高丽时代，佛腹藏的遗物中搭护也有不少。海印寺大寂光寺木造毗卢舍那佛坐像腹藏(图二一)。

李朝时期，搭护成为其国内服制中的一项，并成为常服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馈赠明国使臣、赏赐女真人和国内臣民。如景泰三年，明朝吏部郎中陈钝、行人司司正李宽出使朝鲜，其回国前，端宗赠以「鸦青丝布袂圆领各一领、柳青丝紬帖里各一领、草绿绵紬搭胡各一领」(此三件一套常服)并人参、各色毛皮、纸张作为使臣回国的路费^{三〇}。

李朝搭护实物，墓葬所出亦复不少(图二二)。宋美璟曾详细考察这些墓葬所出的总共五十八件搭护实物的色相、质地、形态及演变，认为搭护最终演变为朝鲜的战服^{三一}。



图二一 高丽 丝紬交织搭护
海印寺大寂光寺木造毗卢舍那佛坐像腹藏



图二二 李朝 搭护
南以兴墓出土

三〇 《李朝端宗实录》卷二，「端宗即位年(景泰三年，一四五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丙戌」条。
三一 宋美璟：「조선시대 담호(搭胡)연구」，《세계사연구》(『북신』)第十号，二〇〇九年，第五一—六七页。

四 文禽武兽——胸背

(一) 元代胸背

胸背，为蒙元服饰较具特色的一种装饰。所谓胸背，即方形的装饰花样，其装饰部位，顾名思义即为前胸后背。关于胸背，赵丰通过对现存的十余件胸背实物及相关图像的考察，指出蒙元胸背的制作工艺乃以妆金为主，少量则采用销金。胸背约在三十厘米见方，其纹样包括龙、凤、麒麟及鹿等，但并无等级之别（图二二二）。关于其源流，赵丰也指出蒙元胸背源出金代，明清时表示官员等级的补子即源出胸背。胸背与补子的区别在于：胸背乃在服装上一次织成，或刺绣或印花，胸背与服装相连；补子则或织或绣然后再补缀于服装之上^{三三三}。

文献中最先提及胸背的当数《元典章》。其中载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三月十一日暗都刺右丞道：「尚书两个钦奉圣旨，胸背龙儿的段子织呵不得事，教织着似咱每穿的段子，织缠身上龙的，完泽根底说了，各处遍行文书禁约休织者。钦此！」^{三三三}关于胸背的更多记述，则出自高丽文献。《朴通事谚解》讲到两个操马舍人，其中一人穿着「明绿抹绒胸背的比甲」，崔世珍于此文下注云：「胸背，凡于纱罗段锦之上，以彩绒织成胸背之纹，裁成衣服者也。」



图二二二 元 缠枝牡丹绫地妆金鹰兔胸背袍胸背
蒙元文化博物馆藏

^{三三三} 赵丰：《蒙元胸背及其源流》，《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艺纱堂，二〇〇六年，第一四三—一五八页。

^{三三三} 《元典章》卷二十九礼部卷二「服色」条。又见《通制条格》卷第九「衣服·服色」条。

(二) 明清胸背

元明易代，胸背被明朝袭用且流衍为补子，成为明清两代品官服饰上的重要特征。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物部四」载：「国朝服色以补为别，皆用鸟兽，盖取古人以鸟纪官之意。文官惟法官服豸，其余皆鸟，武官皆兽。」^{三四}

《明史·舆服志》载：「（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鹤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蒙元胸背上无等级差别的龙、凤、麒麟及鹿等动物至此有了等级上的差别。除了用以区分品官等级的补子之外，明代尚有皇帝作为赐服专门赐给臣工的赐补，如蟒、斗牛、飞鱼等（图二四）。到了明代后期，每逢节庆，又有各色所谓的应景补子。如元宵节用灯笼补子；端午节用五毒补子；七夕节用鹊桥相会补子（图二五）^{三五}；中秋节用月兔补子；千秋万寿节则服「寿」字、双喜补子等^{三六}。

明代「胸背」之名仍屡见于文献。《明史·食货志》载：「正德元年，尚衣监言：『内库所贮诸色纁丝、纱罗、织金、闪色，蟒龙、斗牛、飞鱼、麒麟、狮子通袖膝襴并胸背斗牛、飞仙、天鹿，俱天顺间所织，钦赏已尽。乞令应天、苏、杭诸府依式织造。』帝可之。乃造万七千余匹。」《明实录》中「胸背」「补子」之称并见，两者的区别殆为制作工艺上的差别。

明清鼎革后，补子仍被沿用。据《大清会典·冠服》所载，其补服制度如下：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鹤鹑，九品练雀；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子，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都御史、副都御史、按察使、给事中、御史等獬豸。

从明代传世及出土的补子实物来看，其制作方法有织、绣、缣三种。早期的补子尺寸较大，制作精良，用色大胆活泼。到了清代，补子尺寸较明为小，且用色趋于保守单调。在补子纹样上，明朝文官补子所用禽鸟单双皆有，清代则只用单禽，武官补子则仍作单兽（图二六）。在补子形式上，明清品官所用补子都以方补形式出现，惟清代补服作对襟式，补子前片对开，后片则为整片。民国三年颁布的祭祀冠服上，其所谓的「团」近于补子的形式，但其中融合了十二章纹样（图二七）。

^{三四}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物部四」，上海书店，二〇〇一年，第二五一页。

^{三五} 故宫博物院藏酒线绣鹊桥相会补子在后世被用作经套留存下来。

^{三六}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九、二十，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一六五—一八四页。

图二四 明 缙丝斗牛补子
纽约怀古堂藏



图二六 清 辑米珠绣豹补子
丹佛艺术博物馆藏



图二五 明 洒线绣鹊桥相会补子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七 民国 祭祀冠服一等衣上的团 (以九章为一团)
图片出自《锦绣文章》



(三) 朝鲜胸背

蒙元胸背的影响亦及于域外的朝鲜半岛，高丽时惜实物无存，图像资料未见。李朝取代高丽后，其胸背出于明朝政府所赐者尤见记载。《李朝文宗实录》^{三七}所载，文宗即位之年（景泰元年，一四五〇年），明朝政府所赐胸背即有：「纁丝织金胸背麒麟红一匹、青一匹、暗细花红一匹、素绿一匹，罗织金胸背麒麟红一匹，织金胸背狮子青一匹、素红一匹、素绿一匹」等^{三七}。

朝鲜所行的胸背制度无明清时的补子制度规整，故屡有官员议行胸背之法。端宗时，检讨官梁诚之议行胸背之法，端宗下令大臣讨论。其后议定，端宗命令以此施行^{三八}。大致而言，朝鲜的胸背制度为：国王用五爪龙补；王妃用五爪龙补、凤凰方补；王世子用四爪龙补，王世孙用三爪龙方补；大君（国王嫡子）用麒麟补，诸君（国王庶子）用白泽；文官一品孔雀，二品云雁，三品白鹇，武官一品、二品虎豹，三品熊豹；都统使，狮子；大司宪，獬豸。其时胸背，李朝容像上所见多有（图二八），而其实物，衍清郡主墓等所出胸背尚具明代风格（图二九）。李朝中后期的胸背实物，传世及出土更多，此不烦举。



图二八 李朝《柳顺汀容像》上的织金孔雀胸背
韩国京畿道博物馆藏



图二九 李朝 獬豸补子
衍清郡主墓出土

^{三七} 《李朝文宗实录》卷三，「文宗即位年（景泰元年，一四五〇年）八月三日甲戌」条。
^{三八} 《李朝端宗实录》卷十二，「端宗二年（景泰五年，一四五四年）十二月十日丙戌」条。

五 宝带攒装稳称腰——带具

蒙元时代带具上的装饰有所谓的「闹装」。闹装，又称攒装。关于闹装，明人杨慎《词品》谓：「京师有闹装带，其名始于唐。白乐天诗：『贵主冠浮动，亲王带闹装。』薛田诗：『九苞缩就佳人髻，三闹装成子弟鞞。』词曲有『角带闹黄鞞』，今作『傲黄鞞』，非也。」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中谓白居易诗「带」字原作「鞞」，乃杨慎因其时有闹装带而妄改，并谓：「闹装带，余游燕日，尝见于东市中。合众宝杂缀而成，故曰闹装。」据此，可知闹装带即以镶嵌宝石珍珠等的金细工工艺制成的带具。

蒙元时代用以束腰的带具大致有革带、绦环、绦钩。革带即在皮质带鞞上饰以金玉等的带具，蒙元之前历朝有之，大抵用于朝服、祭服、公服、常服等；绦环、绦钩（与带钩异）虽肇源于宋，但佩用之盛当在元明，大抵用于戎服、燕居服等。

蒙元革带之制，大抵有如前代。其实物见于江苏省吴县元初吕师孟墓^{三九}。墓中所出带由方形带跨七块、长方形带跨一块、花形带孔眼的带跨一块组成（图三〇）。方形带跨殆即后世所谓的「排方」，长方形带跨一侧略带弧度，此即铎尾，缀于革带末端。铎尾，又名挞尾、獭尾、插尾或鱼尾。元人革带材质、所用纹样，《元史·舆服志》上所言并不完全。周德清《赠玉带》历数玉带纹饰，可见其时带饰纹样之繁。

绦环和绦钩，蒙元初时用以结系绦带的带具钩、环分离，钩称绦钩，环称绦环。《老乞大谚解》云：「系腰也按四季。春里系金绦环；夏里系玉绦环，最低的是菜玉，最高的是羊脂玉；秋里系减金钩子，寻常的不用，都是玲珑花样的；冬里系金厢宝石闹装，又系有综眼的乌犀系腰。」《朴通事谚解》记一人操马舍人的打扮为「刺通袖膝襴罗贴里上，珊瑚钩子系腰」，文下注云：「钩子，用金、银、铜、铁、玉、角等物，刻成龟、龙、狮、虎之头，系之于绦之一端，人若带之，则又以绦之一端屈曲为环，纳于钩兽头之空以为固，使不解落，如绦环之制然。」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所出绦钩，其为玉质，刻成龙头，且其上绦带并存，与《朴通事谚解》所说正合（图三一）。

蒙元时代各类带具，《元史》等文献所载甚多，有金系腰、金带等。其中关于「宝带」的记事亦夥，

^{三九}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元墓清理简报》，《文物》一九五九年十一期。

其时宫中服用宝带亦有专门的收贮机构，《元史·百官志》载章佩监职掌为「掌宦者速古儿赤所收御服宝带」，用于下赐臣僚的宝带抑或出此。《元史》中所谓的「宝带」「七宝带」当即闹装带。

闹装，推原其始，本用于唐宋时代的鞍辔之上。白居易《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云：「贵主冠浮动，亲王辔闹装。金钿相照耀，朱紫间荧煌。」至蒙元时代，始见用于带具之上，且后为明朝所袭用。闹装之名虽早见于唐宋时代，但与蒙元时代并明代所见或有不同。两者之别或即在于宝石，唐宋时代虽然「宝带」之称常见，其华丽者黄金、宝石、珍珠兼具，但宝石体量较小，而其时此类装饰且有专称，名为「金筐宝钿珍珠装」^{四〇}，非名「闹装」；蒙元时代因混一宇内，疆域空前广阔，其时波斯等域外宝石多有入华者，故此带具上所见的宝石体量较大、品种亦多。明代承元之旧，亦能为继。

^{四〇} 韩伟：《法门寺地宫唐代随真身衣物帐考》，《文物》一九九一年第五期。



图三〇 元初 御仙花金带跨
吕师孟墓出土



图三一 元 玉缘钩
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

图三二一 《明成祖御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二二 《明宣宗御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蒙元时代闹装带实物，目前未见，但验诸其时画作，刘贯道所作《世祖出猎图》中元世祖腰间所系正是嵌镶有各色宝石的闹装带（见图二一）。明代闹装带则图像和实物并有存世。南薰殿旧藏明代帝王像中，明成祖、明宣宗、明英宗、明孝宗等腰间所束即闹装带（图三二一、三二二）。至于实物，则多见于考古发掘。如万历帝定陵出有十四件带具，革带、绦环、绦钩并见（图三三）。

由以上所论，可知蒙元冠服及其装饰艺术并未随着蒙元政权的覆灭而消亡，而是在长远的时间和广阔的地域中产生着影响。而这其中，帽笠、辫线袄、搭护、胸背等又可谓是一「胡服变作汉衣冠」显著的例子。

图三三 明万历
镶珠宝蝶龙云头形金绦环
定陵出土

